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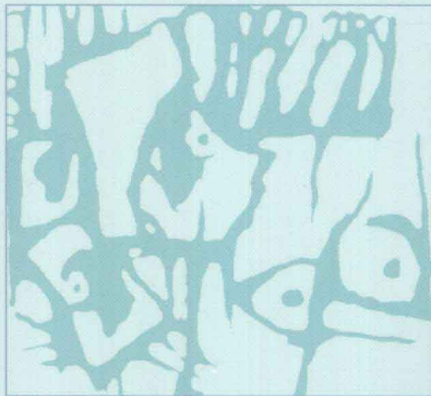
南强社会学  
文库

# 风险决策与 风险管理

基于系统理论的研究

**Risk Decisions and Risk  
Management**

A Research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 周志家/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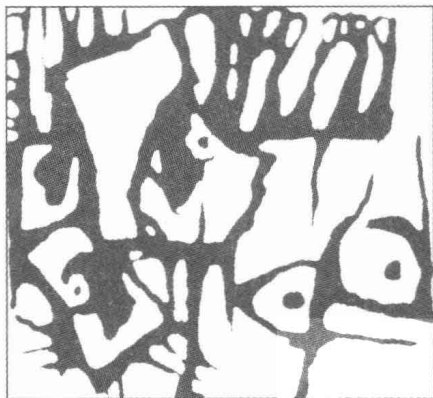
南强社会学  
文库

# 风险决策与 风险管理

基于系统理论的研究

**Risk Decisions and Risk  
Management**

A Research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 周志家/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决策与风险管理：基于系统理论的研究/周志家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  
(南强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5097-3541-1

I. ①风… II. ①周… III. ①风险决策 ②风险管理  
IV. ①F069.9 ②F2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0960 号

· 南强社会学文库 ·

### 风险决策与风险管理

——基于系统理论的研究

著 者 / 周志家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王 颖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吕伟忠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4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541-1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风险与管理：风险社会学的缘起与范式”的课题结题成果，并受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出版资助，特此致谢！

## 《南强社会学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胡 荣

编委会成员 胡 荣 张友琴 李明欢  
徐延辉 叶文振 周志家  
朱冬亮 童 敏 张云武  
戴小力 易 林

# 总 序

---

胡 荣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社会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现在各大学都建立了社会学系，社会学培养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也有了相当的规模。与国内其他高校一样，厦门大学的 sociology 学科重建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3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厦门大学哲学系正式成立社会工作专业；2000 年 3 月，厦门大学在哲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上组建社会学系；2001 年设立了社会学硕士点；2003 年增设了社会学本科专业；2005 设立社会学硕士一级学科，并成功地申请设立了社会学博士点。在这几年中，我们还组建了一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师资队伍，目前，任教的教师绝大部分有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们分别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美国犹他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日本山口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境内外著名高校。他们以自己扎实的研究获得了社会学界的认可。

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坚

持学术规范的基础上与国外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话。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学也是起源于欧美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的社会学发展相对成熟，有了大量的学术积累，也形成了各种流派和理论。因此，在恢复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过程中，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西方社会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话。而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与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进行对话时，就必须坚持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这就像开车必须有交通规则一样。这些学术规范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被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所共同遵守。虽然这些规范有些束手束脚，使大家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格式，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但是有了这些规范，不同学者的研究才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流，才有利于学术研究的逐步积累，才可以避免简单的重复劳动，才可以使不同国度的学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进行交流和对话。学术研究是通过不断的积累进行的，我们每从事一项课题研究之前，或是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都要熟悉相关的文献，了解在这一领域前人都做了什么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然后我们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点新的东西。由于学科不断发展，学术的积累也越来越多，每个领域相关的文献也越来越丰富。如果说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研究者可以轻易地从其中的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的話，那么，随着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学术文献的积累，一个研究者要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了。记得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在我国恢复重建的时候，许多人是从哲学或其他学科转过来的。这些人在社会学里往往从事多个领域的研究，今天可能写一篇婚姻家庭社会学的文章，明天又可能做起社会分层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些年，随着这个学科的逐渐成熟，每个领域的文献也多了起来，一个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就难以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

域。而在欧美各国，研究者从一个分支领域转到另一个分支领域就比我们要困难得多，因为在一个新的领域里，研究者可能要花上三五年的时间才能熟悉文献，而只有在熟悉了这个领域的文献之后才能做出有点新意的文章，才能在新的领域发表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由于学术研究是在积累的过程中发展的，因此，一般的学术专著或论文都会花一定的篇幅来回顾相关的文献，回顾前人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在介绍自己的观点时引用相关的研究进行讨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研究与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如果学科的建设是座高楼大厦的话，那么这个学科的每一项研究成果、每一本著作和每一篇文章就是构筑这座大厦的砖块。砖块必须按一定的规则垒砌才能建成大厦，每一项研究成果必须与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其实，研究者的一篇学术论文，能够不注明出处的地方并不多，引用别人的观点、数据和材料要注明出处，自己通过问卷或访谈获得的资料也要说明来源，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不需要加注了。如果所有的学术论文都能做到规范地引用他人文献的话，学术研究就会在大家的努力下不断发展。每一篇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都应该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新观点或新发现。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或发现，每一个在特定领域进行研究或写作的学者都会全面地引用或提及这一领域已有的文献。但是，目前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一些文章虽然也会引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著中的一些原话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种引用往往只是片言只语的引用，而没有系统地引用相关的前人文献，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发现或观点与前人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和讨论，读者无法知道一篇文章究竟有没有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其结果是使得许多研究沦为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一些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的学者也想系统地引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



果，但他们在查阅相关文献的时候，发现许多作者的观点和发现都是大同小异，于是常常陷于想引用又无法引用的尴尬境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学术刊物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方面，近几年的《社会学研究》做得不错，2005年改版后的《社会》也是如此，虽然发表的文章水平与国外的同行尚有一定差距，但引文都相当规范。这些年笔者也力求按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方式做一些研究及写一些文章，但常常发现不容易投稿，因为除了可以投给《社会学研究》等几个刊物外，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并不适合。如果要在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那就只好削足适履地删掉成串的文献，砍掉“无关的”文献回顾部分。其实，如果能够有多一些的刊物像《社会学研究》、《社会》一样要求作者写规范化的文章，也就会带动整个学术界形成一个氛围，让更多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符合学术规范。

提升中国社会学研究水平的另一个问题是要加强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具体的事件与更广泛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人的知识是分为不同层次的。笔者曾经根据人的知识的抽象程度将其分为生活经验、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三个层次。<sup>①</sup>生活经验是最低层次的知识，是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性质、特点及其与其他事物关系的认识。每一个人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不同，接触的人和事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对于所经历过的人和事都有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体验。科学知识则是以观察为基础，同样也源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但由于通过普遍概念对一系列事物进行概括和抽象，所以反映的是某一类事物的情况。由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这一层次的知识也就摆脱了此时此地的限制，在较广范围内适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哲学知识则是以理性的反省为基础，是关于普遍规律的认识。如果

---

① 胡荣：《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说科学知识基本上以直接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话，那么哲学知识则无法只凭经验观察的资料进行概括，因为哲学知识试图从更抽象的层次上对事物进行认识，所以仅凭经验观察的资料是完全不够的。研究者使用的材料中既有经验观察的资料，也有个人的经验，还有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历史资料。研究者通过想象力对这些材料进行概括，把各种抽象出来的要素联系起来，再把这些联系当素材使用。那些以哲学家的身份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人所提出的理论当然应包括在这一层次内，这些知识是很抽象的。除此之外，个别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中那些不完全以经验为基础的较为抽象的理论也属于这个层次。

现代社会科学强调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其具体的方法通常分为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两种。通过一些个案进行定性研究的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更接近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经验，而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进行的定量研究则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为了使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与较抽象层次的理论联系起来，研究者通常都会把自己的研究与相关的理论联系起来，在文章或著作中花一定的篇幅介绍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理论背景或理论框架。通常，这些理论的抽象层次并不高，这些理论中的有关命题和假设是可以通过定性或定量的实证材料加以证实或推翻的，因此充其量只能算是“中层理论”。例如，关于社会网络与求职的关系，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弱关系假设”，研究关系本身是如何使求职者获得较好的工作的。<sup>①</sup>他在波士顿郊区的一项调查显示，57%的被访者在最近一次职业变动中是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了解职业信息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正式市场渠道。由于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是联系不相似个体之间的纽带，因此弱关

<sup>①</sup>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系作为沟通不同群体的信息桥在求职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而边燕杰在中国的研究却表明，在计划经济下强关系对于求职者更为重要：中间人与求职者的关系越熟，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求职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sup>①</sup>边燕杰因为这一重要发现而为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理论是相当具体的。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的抽象程度比较高，例如，理性选择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

中国社会学的繁荣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研究不同层次的社会学理论。目前，国内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人不少，但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并不多。要想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中有更高的地位，需要中国的社会学者在理论方面有所创新、有所贡献。要想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有所贡献，中国的社会学者首先要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一些人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国外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和现实，因此一概加以拒绝。其实，中国的社会与西方既有不同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但我们绝不可以对这些理论视而不见，或以强调中国特色为由而将其拒之门外。理论有不同的层次，通常，越是宏观层次的理论适用的范围也越广，越是具体的理论适用的范围也就越窄。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属于宏观层面的一个理论，唐斯可以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美国社会选民的投票行为，我们在研究村民选举的时候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未尝不可。理性选择理论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但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这一理论本身的不足造成的。有些具体的中层理论的适用性确实会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前面说过的格兰

---

① Bian, Yanjie. 1997.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266 - 285.

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在中国就不太适用。但中国社会的这种不同也正是我们发展理论的最好机会，边燕杰正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提出“强关系假设”而发展了这一理论。其实，一些很具体的研究结论在中西方社会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以笔者对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的研究为例，有关男性的网络密度低于女性的发现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sup>①</sup>

其次，我们还要提出自己的理论，形成中国的社会学流派。也就是说，学习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评判上，也不能只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或是运用中国的研究数据验证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理论概念，而是应该提出中国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研究。

总之，中国的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必须坚持被世界各国学者所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注意学习国外成熟的东西，了解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国外同行的研究进行对话。由于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中国社会有自己的许多独特之处，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只要我们坚持相应的学术规范，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产生出一些好的作品，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从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自从厦门大学于2000年重建以来，我们的同仁一直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踏踏实实地研究，我们推出的这套《南强社会学文库》就是大家近年来从事研究的成果，希望这套文库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所助益。

---

<sup>①</sup> 胡荣：《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 前 言

---

在本书写作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传来了甬温线发生动车追尾重大伤亡事故的消息。动车和高铁技术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能够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少数技术之一，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故，几乎在所有人意料之外。《南方周末》事后就以“不可能事故”作为标题，分析此次事故的性质和原因。事实上，早在1984年，美国学者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就已发现，高新技术一般都具有子系统之间联系紧密、互动复杂的特点，正因如此，在他看来，高新技术事故频发，恰恰是“正常的”（佩罗，1988）。

甬温动车事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极大关注，并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安全”的担心。网上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语，足以印证民众的这种忧虑。

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名旅客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位公民都不被“时代”抛下！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变迁后，民众已经开始渴求“安全”，希望不要被快速的“时代列车”抛下。那么，“安全”是什么？许多人也许会回答：安全就是没有风险。事实上，在多学科的风险研究中，“安全”也确实曾经长期被视为“风险”的对立面。然而，仔细一想，如果放弃了动车和高铁，我们真的就“安全”了吗？首先，假如放弃动车和高铁，人们就必须更多地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公路、飞机等），而这很可能导致其他交通工具事故概率的上升，因而，从总体上讲，我们的出行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安全”；其次，即使放弃动车和高铁会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为安全一些，但我们将由此“收获”出行慢的风险，并可能因此而在其他领域丧失一些“安全”上的机会：安全的岗位、安全的合同、安全的恋爱机会等。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放弃动车和高铁有可能使中国面临发展机遇上的巨大风险。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对“安全”的追求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无时不在。那么，为什么社会会发展成这种局面？在风险已经普遍化的情况下，个人、组织甚至国家应该如何

决策？这些，从大的方面讲，正是风险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是对西方风险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进行系统梳理；二是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以便探讨“理性的风险决策和风险管理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笔者选择德国社会学大师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作为本书的重点和分析基础。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社会理论，因而，它对现代社会的“解析度”应该是最高的。二是，正因为该理论体系构建非常复杂，社会系统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规范的传播，因而存在着明显的学术研究上的需要。三是与社会学学科内其他的风险理论相比，基于社会系统理论的风险研究站在更高一个层次（卢曼称其为“二阶观察”）观察社会和风险，因而，该理论具有较高的反思性和深度。

本书第一章简要回顾多学科风险研究的发展历史，并重点介绍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五大社会学风险理论流派。第二章致力于梳理和分析社会系统理论的风险视角，让读者了解社会系统理论及其风险视角的基本主张和特点。第三章到第七章汇集了笔者近几年的有关风险决策和风险管理的主要研究成果。具体地说，第三章以风险的系统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早期应对 SARS 的策略，特别突出风险的无知（不确定性）和视角分歧的特性在政府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第四章以对德国大气质量标准化的实证调查为例，

分析在不确定性是主要问题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理性的风险决策。第五章关注的焦点是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类型，在协助政府管理环境与技术风险时，它与政府之间应该怎样配合才是合理的。德国环境标准化协会在履行“为国家减负”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发挥“为协会减负”的作用，以便克服面临的组织问题。因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第六章探讨了在垃圾焚烧场选址中，社会维度变量（户口、居住地）对厦门居民态度选择的影响。文章发现，户口对民众的风险接受具有分割作用，而政府对垃圾场的有效管理和对受损群体的合理补偿可以让“邻避效应”失效。在几乎所有的风险理论中，社会运动（或“群体性事件”）都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因如此，最后一章以对厦门市居民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居民参与环境运动的动机，并进一步探讨此次环境运动的动员机制和参与的公民性。

在上述几章中，第四章“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决策——以德国大气质量标准化为例”曾发表于《公共管理研究》2010年第8卷；第五章“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组织问题及其克服——以德国环境标准化协会为例”曾发表于《德国研究》2009年第2期；第七章“环境保护、群体压力还是利益波及？——厦门市居民PX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曾发表于《社会》2011年第1期。在此，感谢相关编辑部同意几篇文章收录于本书之中。



在系统理论看来，现代社会的所有“决定”或“决策”都是风险决定或风险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管理”可以被理解为政府或其他管理机构做出的旨在防范或降低风险的决策。本书以“风险决策与风险管理”作为书名，意在突出风险与决定（decision）之间的紧密联系。本书既有对风险社会学主要理论流派的全面梳理，也有对社会系统理论的风险视角的重点探讨。实证研究部分既涉及政府的风险管理，也有对科学机构和非政府风险决策的研究，还有以民众的风险接受和风险应对（环境运动参与）为焦点的研究，在研究层次上包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

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为“风险社会”，是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是有风险的：即使是选择“不做任何决定”也是一种决定，因而也是有风险的；同样，以减少风险为目的的风险决策和风险管理本身也有风险。对学者而言，不申请科研课题固然有风险，但做一项课题研究也是一种风险决策。在某种意义上，风险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宿命。如果本书能够让读者和同仁对风险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能够对学术研究有所推动，那么，这一历时数载的风险研究项目无疑是值得的。

本书献给我的妻子梁素惠，一个会因为爱而无视风险的人。

周志家

2012年5月定稿于厦门